

王文宝 著

中国 民俗学 发展史

辽宁大学出版社

792

26.5/2
125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

• 王文宝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闻 璐
封面设计 王亚非
责任校对 闻 璐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

王文宝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40千 插页: 6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
统一书号: 11429·012 定价: 1.95元

ISBN 7-5610-0042-1/K·3

民國廿年夏 半農四十歲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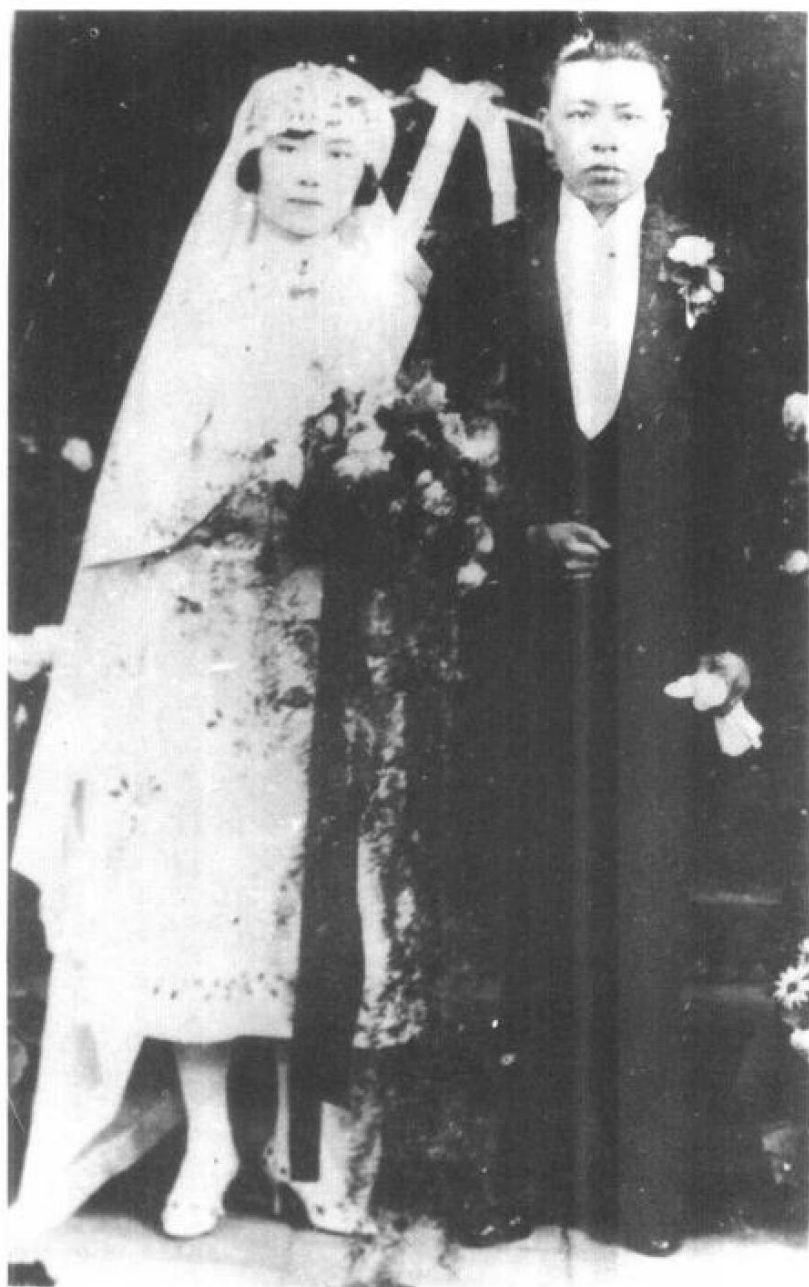
我国歌谣学运动发起者
刘复（半农）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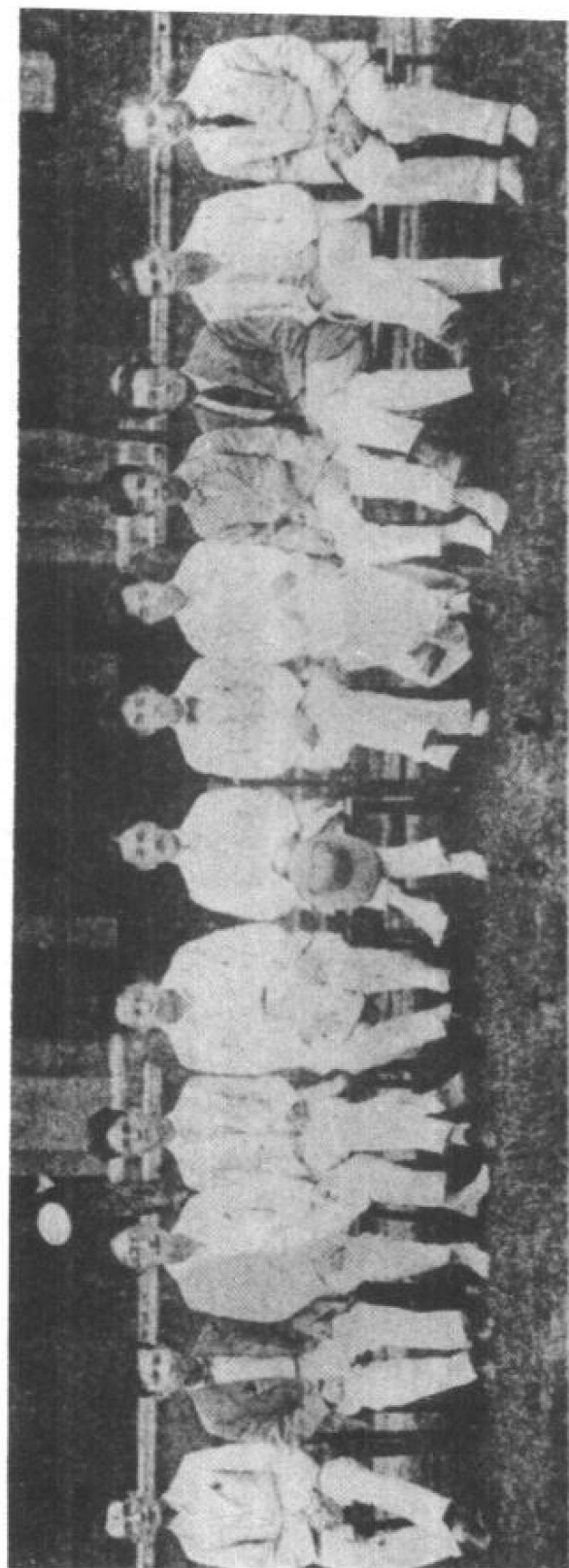
1918年2月1日，
《北京大学日刊》“纪
事栏”刊登《北京大学
征集全国近世歌谣
简章》，蔡元培发表
《校长启事》表示支
持



鲁迅为《歌谣周刊》之《歌谣纪念增刊》
单行本设计的封面，字迹和图案为蓝白二色，
字为沈尹默书写



《歌谣周刊》主编常惠先生与民俗学者
葛孚英先生（1924年）



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會員大會第一屆全體合影

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會員大會第一屆全體合影

傅斯年	戴季陶	楊成志	顧頔剛	容肇祖	崔載陽	余永梁	馬太玄	劉萬章
					鍾敬文	陳錫襄	黃仲琴	



三十年代时之
江绍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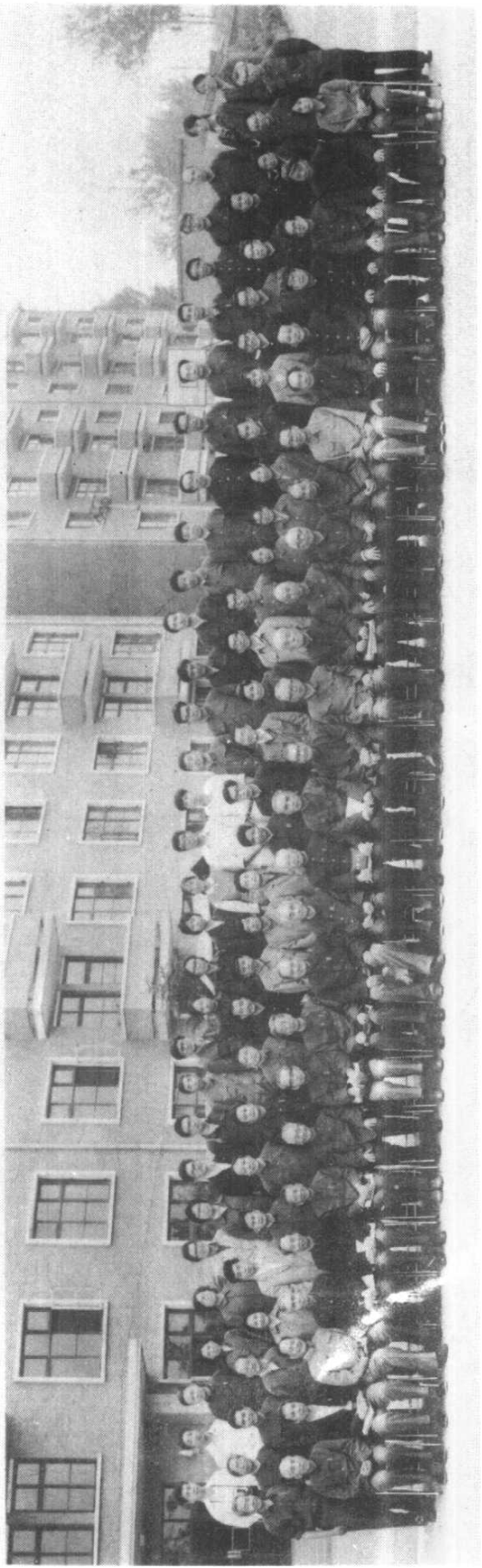
杭州《民俗周刊》第60期
休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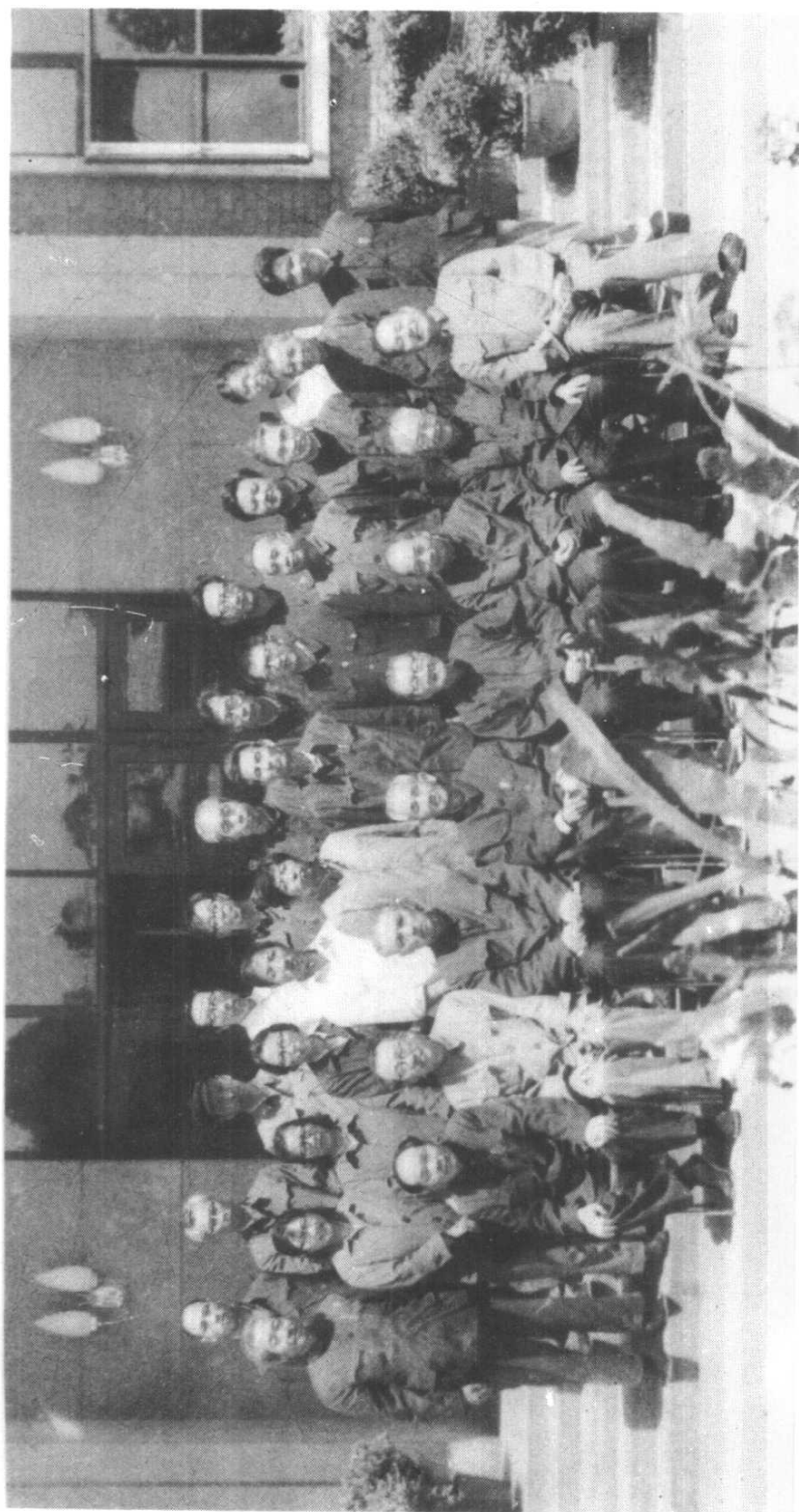
1979年5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座谈会留影

第一排左起杨成志 顾颉刚夫人 顾颉刚 朱素甫·玛玛依 于道泉
容肇祖 钟敬文 常惠
第二排2-4人为常任侠 马学良 贾芝 毛星

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大會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北京



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大會與會者留影



中国民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

序

乌丙安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随着举国上下掀起的振兴民族文化与科学的新浪潮，我国民俗学也出现了新崛起的大趋势。近几年中，在民俗调查、民俗研究、民俗资料和论著的出版、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以及民俗科学队伍的成长壮大等方面，都呈现出十分积极活跃的势态。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文化热”或“民俗热”。就在这民俗学发展初见繁荣的时刻，王文宝同志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出版，无疑也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俗学 (Folk-Lore) 虽然是科学史上年轻的新兴学科之一，但是如果从一八七八年民俗学首先在英国确立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渡过了将近一百一十年。如果用现代科学的时间观念来衡量，这门学科至少应该步入中年了。民俗学传入我国稍晚，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一九一八年，方破土萌芽，以后经过了一段繁荣时期逐步发展起来。至今已经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比起许多年轻的现代人文科学不能算短了，它是我国现代科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俗学工作者都有责任为建设民俗科学史做出努力。《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出版，为填补我国科学史的空白做出了贡献，很值得民俗学工作者共同庆贺。

我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四九年

FH-17/106

新中国成立时这一段为期三十年的民俗学历史，除可查阅到的有限的学术资料做了某些反映以外，绝大多数“活”资料几乎都贮存在几位亲身经历过这三十年的老一辈中国民俗学奠基人的记忆中。至于建国后我国民俗学曾在一长段曲折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又不是十分清晰。然而，中国民俗学的新崛起和当代民俗学科的建设，急需继承和发展，急需总结这七十年间的民俗发展历史。谁都知道，任何割断历史、在沙滩上筑起民俗科学大厦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科学准确地弄清和理顺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就成为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工作。王文宝同志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问世，把这个意义充分显现出来了。

对中国民俗的科学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引起了英国民俗学者的兴趣。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新诞生的民俗学，就使得国际民俗学界更加注视。过了不久，有些外国学者便先后参加了研究我国民俗的行列，甚至后来有的学者还涉足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本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的日本民俗学家直江广治教授的代表作《中国民俗学》（岩崎美术社出版的民俗民艺双书之十三）出版了。书中用了五十页篇幅的十个专题概述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四十余年的历史。七十年代中期，直江博士再一次在全五卷《日本民俗学讲座》（和歌森太郎主编，朝仓书店出版发行）中，专节介绍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简况。最近几年中，联邦德国的中国民俗研究者英格·南特威格（Ingo Nentwig）先生和玛瑞勤·弗里茨（Mareile Flisch）女士也撰文介绍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部分历史。这些都加深了国际范围对我国民俗学发展的了解。但是，勿庸讳言，外国学者对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的熟悉程度，终究是有种种局限的。随着我国科学现代化的进程，国际民俗

学界越来越普遍需要从我国拥有的第一手科学资料中更直接地认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全面历史，王文宝同志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恰好满足了这种急切的需求。

一部科学史首先应当是一部信史。历史唯物主义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应当是信史的基本标准。它要求史料翔实、史事真实、史论确实。民俗科学史自然也不例外。我认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做为—门学科的信史，已经具备了上述的“三实”。

我国的民俗学史料，除保存在早期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的资料较为完整外，其他发表在各种地方报刊上的资料，十分零散。经过半个多世纪中的社会动荡和战乱，许多资料已经散失。本书作者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不顾艰辛，亲自奔走在北京、上海、杭州等许多历史上民俗学活跃的地方，查找史料线索。甚至到各地寻访老一辈民俗学者和有关当事人，从私人收藏的书刊、剪报中查询珍贵的史料，力求详尽和可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所搜集到的史料，都做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对那些民俗学史事活动的疑点和细节，都分别进行了科学鉴别和核实。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曾多次登门拜访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杨堃、常惠等十多位老一辈民俗学家，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师生情谊和学术交往关系，向他们虚心求教，并共同回顾了我国民俗学开创期及以后的曲折复杂历程；彼此研讨或争论我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及新崛起形势下实事求是判别史事等问题。他终于用确凿的证据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调整了某些不妥贴的见解，写成了这部具有中国民俗科学史文献价值的著作，为近七十年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结。

使这部民俗科学史切实达到科学信史的重要因素，除了作者做到“三实”以外，作者亲自参加发展民俗学的实践活动也是

值得注目的。文宝同志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民俗学新崛起活动的积极参加者、组织推动者和全面见证人。近十年来,他一直在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全国性民俗研究动态与科学信息交流工作。他热情鼓舞并积极支持全国许多省区成立了民俗学会。他还十分热心地参加了筹建中国民俗学会的全过程。以后又在中国民俗学会进行民俗学界的组织联络工作和民俗调查研究工作。他对于全国民俗学的发展,不仅十分了解,而且体验至深。他这种积极的默默无闻地坚持参加发展中国民俗学的实践,为这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信史基础,注入了有科学生命力的丰富营养。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这部史著的内容和形式,我做为先睹为快的读者之一,不想再做过多的评论。我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历史,是老、中、青三代民俗学工作者共同谱写的篇章,因此,对本书的全面评价还是由大家来做为好。不过,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认真读罢这部著作,我认为作者确实是我国民俗学工作者可以共同信赖的代笔人和代言人,堪称我们民俗科学王国的公正的史臣。本书的出版,为推进民俗学事业的新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后,要为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说几句必须说的话。辽宁大学出版社从建社以来便把出版民俗学论著列为重点之一,是很有远见的。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等认真预测了我国民族民俗文化发展的前景,积极支持发展民俗学事业,为建设现代人文科学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他们对《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出版十分重视和关心,和作者共同对原稿做了反复推敲和修订,最后以最短的时间付印出版。这本书的问世,既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也融汇着编辑的汗水。做为一名读者,我向作者、编者深致感谢,并愿和他们一起为民俗学事业的繁荣做出努力。

1987年清明夜·沈阳

自序

民俗，是一种传承的民间文化。对这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民俗学，在社会上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

几年来，在开展民俗学工作中，逐渐使我产生了要写一部中国民俗学运动发展史的念头。不断地搜集资料，并先后为一些刊物试写过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我国民俗学运动发端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又加上屡遭战乱，材料很不易找到。虽然我已搜集了可观的材料，但还有不少目前尚未找到，然而我国民俗学运动的主要线索和材料基本上还是摸清了。我感到有责任写出这一本书，使大家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我国民俗学运动发展历史的真面目，以利于我国新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从积累材料到动笔，前前后后经过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写作任务。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问，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究竟始于何时，说法不一。许多国家很早以前就有了关于民俗材料的记载，甚至零星的或个别的议论，如果据此断定民俗学之发端，是比较困难的。但民俗学研究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学术运动，其历史渊源却是比较清楚的。

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于公元一八四六年，将撒克逊语之“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面为一，创造了“Folklore”（“民众知识”或“民众学问”）这个新名词，

一八七八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俗学组织——英国民俗学会，并创办了第一本民俗学杂志——《民俗学刊》（《Folklore Record》）。“Folklore”一词慢慢为国际上所承认和使用；并由原来的“民众知识”或“民众学问”，逐渐成为既指民俗事象，也指研究民俗事象的科学了。民俗学研究运动乃在世界上慢慢开展起来。就上述情况来看，民俗学之定名、建立民俗学组织机构、编辑出版民俗学刊物，都较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因此，主张国际上之民俗学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之英国，是较为妥当的。这与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迅速发展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英国产生的影响分不开的。英国产业革命后，“大工商业之发展引起大都会之膨胀，及殖民地版图之扩大，更从这两点引起本国中都会生活者和乡间生活者，殖民地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发生道德上、信仰上、思想上、感情上种种齟齬；宗教（基督教）又不能维持往日之权威，已不能融和都会生活和乡间生活及新旧生活之矛盾，更没有能力去同化殖民地土人的思想或陶和其敌对的感情”^①，这就引起了资产阶级学者对人类文化史，包括民俗学的研究。民俗学运动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俗学，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二种。狭义的民俗学，仅指研究一切民俗事象的这门学问；广义的民俗学，则包括民俗事象的材料及其理论研究。

我国的民俗学运动，当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前夕之一九一八年二月开始的征集歌谣活动为其发端。中国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民俗资料极为丰富多采；

① 见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1期，1928年3月21日。